

灾荒冲击下的乡村社会冲突

——以近代淮河流域为中心的考察

房 利

(铜陵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铜陵 244061)

【摘要】近代淮河流域,几乎连年灾荒,自然灾害在不同程度上对乡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极大破坏,民众生活困苦不堪。为了生存的需要,群体之间常引发争夺紧缺资源的社会冲突。在淮河流域,灾害引起水资源、粮食资源以及税租征收等方面的社会冲突。这几种社会冲突类型都与乡民的生计和经济收入直接相关,其社会冲突仍以经济斗争为主,是灾民求生存谋生计的无奈之举。鉴于此,灾害发生后,灾民的救灾安置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否则灾民无以为生,社会势必冲突不断。因此,灾害的有效防治和救助就成为各级政府和民间社会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近代;淮河流域;自然灾害;社会冲突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2-0102-07

Rural Social Conflict under the Impact of Famine

—— A Study on the Huaihe River Valley in Modern Times

FANG Li

(School of Marxism, Tongling University, Tongling 244061)

Abstract:In the modern Huaihe River basin, natural disasters have caused great damage to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of the villagers in different degrees. The people live a life of hardship and misery. In order to survive instinctive needs, groups often lead to the scramble for scarce resources in the social conflict. In the Huaihe River Basin, social conflicts caused by disasters are mainly caused by conflicts in water resources, food resources and taxation. These types of social conflict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livelihood and economic income of the villagers. Their social conflicts are still mainly economic struggles, which is the reluctance of the victims to survive for their livelihood. In view of this, after the disaster, disaster relief and resettlement work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otherwise the victims are not living, the community is bound to conflict, so effectiv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has become the top priority of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and people.

Keyword: modern times; Huaihe River basin; natural disasters; social conflict

冲突是指在财产、地位、价值观以及稀缺资源分配上的不一致,以致双方相互干扰,这种干扰是双方存在意见的对立,并相互作用。社会冲突是社会主体之间由于价值观、资源分配、利益、地位的不一致而产生斗争的互动行为,尤其是稀缺资源占有的冲突普遍存在。近代淮河流域,几乎每年都要遭受

【收稿日期】2016-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ZS043);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16D144);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gxyqZD2016312);铜陵学院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14tlxyrc10)

【作者简介】房利(1977-),男,博士,铜陵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灾害史、生态史等。

自然灾害的侵袭,水灾、旱灾、蝗灾等灾害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极大破坏,从而引起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当灾害打破生存资源在群体之间的均衡分配关系时,常常引发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因此,在灾荒时期,群体之间主要的社会冲突是源于人们对紧缺资源的争夺,如水资源、粮食资源等。当然,淮河流域因阶级对立而出现的社会冲突,即农民起义和暴动,在近代史上占有重要部分,但这方面学术界讨论较多,本文不再赘述。有关近代淮河流域因自然灾害而产生的社会冲突问题,部分学者在其相关著述中虽有所涉及^①,但不够全面和深入,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对因灾害而引起的水资源、粮食资源以及税租问题的社会冲突进行考察和分析。

一、因水资源而引起的社会冲突

近代史上,由于水资源的分配不均,人们为争夺水资源而引发的冲突比较常见。淮河流域地处中原地带,介于长江、黄河之间。作为一个农业区域,其水资源十分重要,但是在灾荒之年,其水资源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是相当有限的,因此,近代淮河流域因水资源的争夺引起冲突也很常见。

一般来说,这种因水资源而引发的冲突主要是指区域冲突,其中包括省际间冲突和省内区域间的冲突。在淮河流域,省际间冲突主要指沿淮各省之间因水资源矛盾而出现的纠纷。省内区域间冲突多为县域之间或乡域之间因水资源的矛盾而产生的冲突。近代淮河流域因水资源而引发的省际间冲突较多,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1928年三河坝启闭的矛盾以及1935年苏北大堤修建的争议。

(一)1928年三河坝启闭引发的争议

三河坝位于洪泽湖湖口,是淮河水流入洪泽湖之咽喉。由于三河坝在安徽省境内,所以其坝由安徽省管理。三河坝“全为节制水量,使水涸之际,洪泽湖方面,得有存水运输;里运河方面,得有余水接济”^②,但对于安徽和江苏两省来说,三河坝的作用完全不同。安徽主要依靠三河坝在洪水较大时,能够启开河坝,以避免灾害;而江苏省却依靠堵塞河坝以利于蓄水发展航运,并且能够接济运河东岸的农业灌溉^③。因此,两省因三河坝的启闭问题经常发生冲突。1928年,安徽省并没有像往年一样对三河坝进行启闭管理,结果导致这一年江苏省里运河的水量严重不足,从而影响其农业灌溉和航运,因此,江苏省强烈要求三河坝收归中央政府管理,不能由安徽省单独管理。于是,两省为了三河坝的管理权问题,发生了纠纷,打起了笔墨官司,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

对于三河坝的兴修与管理,江苏省认为:“苏皖两省委员,负相互协助之义务;对于经办工程之盐商,均有监督指导之职权。储备料土,须经苏省点验。堵坝后,应由江苏江北运河工程处,派员验收。徐坝泛修守员,得随时报告黄罡寺志椿水量,及坝身现状”;而安徽省则不同意江苏省的看法,认为:三河坝坝身为草土筑成,水到湖心,黄罡寺水志为六尺时,这时沿坝河水实际已达九尺了,“常不启而自冲决”,所以不存在“启闭失时”;又由于该坝早已经完全修筑,而且去年复修的时间较往年相比,并未延迟,因此“实无再与苏省会商兴修之必要”。安徽省还认为江苏里运河水量,不能充分接济,是受到张福、天然两河淤塞的影响,与三河坝启闭,并无关系;而且三河坝之冲决,“足分洪湖大堤之水势,此淮扬盐商不愿建筑一劳永逸之石坝,盖恐有害于洪湖大堤,而危及淮扬屏阵”^④。关于三河坝的兴修和启

① 汪志国:《近代安徽: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董传岭:《晚清山东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山东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冯睿:《民国时期安徽淮河流域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安徽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

② 《令饬三河坝工局修固坝工》,《安徽建设》1930年第2卷第7、8期。

③ 《令饬三河坝工局修固坝工》,《安徽建设》1930年第2卷第7、8期。

④ 《解决苏皖两省三河坝争议案》,《安徽建设》1929年第9号。

闭问题的争论,两省都从各自角度考虑,都认为自己有理,国民政府行政院对两省也进行了调解,但双方分歧较大,未能达成共识。安徽省政府认为,江苏省之所以重视三河坝的启闭,主要原因在于储蓄水量,使里运河水量充足,便于航运。但是“三河坝为皖淮下泻之门户”,一旦储水,“皖人迭遭水患”,所以,“顾虑宣泻,实较苏省顾虑缺水为尤甚”。因此,安徽省坚持拥护三河坝权,“实难轻易更张”,而江苏省则认为,里运河的水量,不能充分接济,虽然受到张福、天然两河淤塞的影响,但是与三河坝的启闭有很大关系。三河坝到了堵筑时期而不堵闭,这时洪湖水位必然自落,而张福河的水流量愈少,“其影响于里运水量实大”^①。由于两省关于三河坝问题争议较大,两省之间不能妥善解决,最后被迫上报中央政府裁夺。在考虑到双方百姓利益优先的原则下,中央政府规定三河坝仍按惯例由安徽省进行管理,但江苏省在必要时,可派人查看水位,另外,中央政府加强对河坝的督查。这种处理,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省的分歧争议。此后,两省仍然为三河坝的管辖和启闭问题争论不休。

(二)1935年苏北大堤修建引发的争议

微山湖是南四湖中较大的一个湖,处在苏鲁交界的结合处。抗战以前,沛县、铜山与山东省鱼台、峄县、滕县接壤,而当时微山湖大部属于沛县,小部属于铜山。解放后,根据需要,微山湖划归山东省,专设微山县管理。微山湖主要通过湖口闸和蔺家坝进行宣泄,湖口闸作为蓄水的闸口,不能随便进行启放,而蔺坝附近之地,“河底高亢,虽大水时启放流亦不畅,平时除蒸发外,一遇洪水,漫溢滨湖低地,地势使然也”^②。1935年7月,山东发生水灾,黄河水位陡涨,洪水“大部向东南流,漫菏泽、郛城、巨野、嘉祥、济宁、金乡、鱼台等县,沿洙水、赵王等河注入南四湖”^③。微山湖水位陡然增高,入湖洪水经湖口闸和蔺家坝汇入中运河,运河一时难以容纳,容易导致周边县市受灾,当时,苏鲁两省交界的27县“受灾面积12215平方公里”,而鲁西南的“受灾面积达7700余平方公里,淹没耕地810万亩,淹没村庄8700余个,倒塌房屋近百万间,灾民250万人,其中淹死305人,淹死牲畜4万余头”^④。鲁西南的水灾引发江苏省的洪水灾害,江苏省为了防御此浩劫,“铜山行署督察专员邵汉元命筑建大堤防水,长堤自丰县北境起,循沛县北境经龙固集向东南,沿微山湖西岸至张谷山止,共长160里。铜山县境内由县长王公均监工,征集民夫,历时两月完成,号称苏北大堤。”^⑤但是,未曾想到的是,苏北大堤的修建招致山东省与江苏省之间的争议。

苏北大堤的修建对于苏北县市来说,阻挡了洪水的侵袭,起到了防灾作用,但是对于上游的山东人来说,此堤阻挡了洪水的宣泄,不利于防洪,加剧了山东省的灾难,为此,引发了两省的冲突。7月下旬,济宁运河堤防决口,灾患扩大,山东人民将受灾原因归结于苏北大堤的修建上。7月24日,《时事日报》转载济南电:“鲁黄灾会电中央语:苏省筑堤截黄,强抑水性,即苟安一时,非同舟共济之道。鲁患未弥,岂苏之福?!”^⑥《申报》亦称:“济南:(鲁)各界黄灾救委会今日再电中央,请统筹治黄善策,不分畛域,苏人在微湖南岸修闸,虽苟安一时,但非同舟共济之道。”另外,鲁省主席韩复榘致电国民政府和苏省主席陈果夫:“洙水赵王各河复因连日水势高涨先后决口,究其原因,实由苏省境内筑堤修闸,迎截黄水,使下游不得宣泄,南阳湖水倒灌所致”^⑦。山东省一些绅民也纷纷上书或请愿,对苏省修堤建闸

①《解决苏皖两省三河坝争议案》,《安徽建设》1929年第9号。

②淮河流域水利工程总局:《淮河流域水利建设计划》,民国37年9-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20。

③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微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微山湖(微山湖资料专辑)》,1990年,第32页。

④山东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山东省志·水利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2页。

⑤徐州市水利局编:《徐州市水利志·大事记》,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61页。

⑥上海《时事日报》1935年7月24日。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鲁苏两省对于洙水赵王河决口筑堤修闸及黄河改道发生争执处理情形》,全宗号:一,案卷号:3275。

表达不满,要求毁堤平坝。如藤县居民代表张宗淦等呈文:“为近日黄河决口,水入微湖,往南而下,诂苏省以邻为壑,于鲁台县至张钨山,筑堤一道,又由蔺家坝重筑十五里之堤,致黄水倒流泛滥,以吁请迅飭苏北立毁所筑之堤,并飭苏鲁行政水利机关,挖开蔺家坝,以资拯救”^①。面对山东省的责难,江苏省也纷纷陈诉自己的主张,认为苏北大堤并非鲁省水灾的原因,也并未阻挡洪水宣泄。苏省主席陈果夫就认为,苏北大堤本与鱼台堤相衔接,都在南湖西岸,防南湖水之西泛,并非正面抑逼黄流,所谓鲁境洙水赵王各河现在高涨由于苏境筑堤拦截所致,实离事实太远^②。江苏省政府也向新闻界辟谣:“(今)微湖容量尚未饱满,既未漫溢堤岸,屏障亦未发生功用,更何论壅扼上流,加重邻灾?此堤仅限于微湖西岸,自宜正名为微湖西堤,与鲁境黄灾,绝无关系云。”^③为防止事态扩大,国民政府行政院召集两省官员及水利专家,开会商讨解决办法。会议决定,一方面使黄河由决口南流之水分两条途径导泄,一是命黄委会及山东省政府负责将流入南旺湖之水设法流入东平湖,挽归黄河;二是命导淮委员会及江苏省负责将流入微山湖之水由湖口蔺家坝导经中运河、六塘河、灌河入海。并决定由黄河委与山东省政府迅速派员实地勘查地形,设法引溜归入正河,以期减少口门夺溜数^④。

1935年11月,韩复榘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恢复苏北故道之议,再次引起苏省绅民反駁。面对各方面争议,全经委认为“以黄河改道分流之议,关系綦重,本会自当审慎考虑,至堵筑董庄决口,业经本会商请鲁省政府负责办理并由黄委会协助进行,现已购运物料,着手施工,本会正在督促赶办,期早合龙。”^⑤此项堵口工程进展缓慢,历时半载,决口才合龙,苏鲁之争才告平息。

省内区域间的因水资源的冲突,常常是在县与县之间,乡与乡之间发生。近代淮河流域省内区域水利冲突主要是灌溉和排涝两种纠纷,其中,排涝纠纷稍多。如1869年,为泄河水,减轻灾患,江苏沐阳人王兆昌请开南、北六塘河谢口至侯口之间的扁担沟北横堤,但是此举遭到六塘河下游民众反对,为此,上下游民众屡屡进行诉讼;再如1895年,沐阳发生水患,柴米河南岸居民聚众强行拆毁北堤,遭到河北居民竭力反对,双方发生械斗,酿成巨案。后来,由官府出面,毁掉北堤,“河南之患息,而河北之患未已”^⑥。河南商水县境内多洼地,水系比较紊乱,一遇洪水灾害,洪水不利疏导,常常造成灾患,民谣云“商水湖坡多,淮草地,泽蒜窝,沤烂鞋,泡烂脚,一年四季愁吃喝”。民国时期,由于水灾严重,乡民为了排涝需要,自行挖沟排水,但是水系下游乡民为了自身利益,却堵塞河沟,造成上挖下堵的矛盾局面,上下游乡民常因此发生水利纠纷,甚至聚众械斗,造成家破人亡的局面。境内累坡与龙塘河、大连湖村与林村因水资源排泄问题,一直有水利纠纷官司存在,多年不能圆满解决。另外,商水、上蔡、郾城、项城四县交界,其附近村庄居民也常因排水问题发生冲突而结成世仇^⑦。再如河南境内郾城、西华两县在吴公渠水流泄注颖河的入口地点上争议不断,两县民众为此数十年相持不决。为了解决此种持久矛盾,1933年,河南省水利厅专门派人前往查勘,在考虑双方利益的前提下,拟定了解决原则,后来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鲁苏两省对于洙水赵王河决口 筑堤修闸及黄河改道发生争执处理情形》,全宗号:一,案卷号:3275。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鲁苏两省对于洙水赵王河决口 筑堤修闸及黄河改道发生争执处理情形》,全宗号:一,案卷号:3275。

③ 《苏北大堤即将竣工》,《申报》1935年7月30日。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鲁苏两省对于洙水赵王河决口 筑堤修闸及黄河改道发生争执处理情形》,全宗号:一,案卷号:3275。

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鲁苏两省对于洙水赵王河决口 筑堤修闸及黄河改道发生争执处理情形》,全宗号:一,案卷号:3275。

⑥ 马俊亚:《治水政治与淮河下游地区的社会冲突》,《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⑦ 商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商水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7页。

交由两县地方绅民协商办理,自此,两县水利纠纷才告结束^①。

二、因粮食资源而引发的社会冲突

近代以来,淮河流域生态进一步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几乎是“无年不灾,无灾不荒”^②。伴随连年灾荒,淮河流域各地的农作物无不歉收,农民过着贫困潦倒、民不聊生的生活,民间饥荒普遍,如“涡河两岸,十室九饥”^③。灾荒之年,生存问题成为民众首要问题。由于粮食资源的缺乏,为了求得生存,灾民不得不铤而走险,以“吃大户”、“食大户”、“抢米”等方式抢夺粮食。近代淮河流域的灾民抢夺对象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以富户和地主为目标,另一种是在官府中抢夺粮食。

近代,淮河流域灾害不断,灾民抢粮举动此起彼伏。1928年《申报》曾生动描述灾民为了求生而抢粮的情形:“间有积储之家,饥民啸聚抢劫,或将全家人杀毙者,亦有所闻;市镇买零食者,如稍现外,必将被饥民抢食,无法可办。其他树皮草根,采掘殆尽,空余赤地千里,树多赤身枯槁。……凡居守无粮可食者,则千万人,已成普通现象,其流离道途,似匪似民,蚁聚蜂屯,呼吁无告者,实在不计其数。”^④如1914年,河南大旱,“淮北饥民,蜂起抢粮”^⑤;1922年,在河南省周家口,数千饥民聚集在周家口北岸,向各街抢夺粮米,并将沿河十余只麦船抢夺一空;1942年大旱,在饥饿的驱使下,河南灾民将目标瞄向了国民党的官仓,甚至“一大批暴动的农民直逼洛阳西宫(河南省政府所在地)”^⑥。近代安徽从皖北到皖南到处发生抢粮事件,就连当地官员也感慨:“此间民情强悍,伏莽本多,迭遇奇灾,铤而走险,在在可虑,抢米之案,已成见惯司空”^⑦。1910年,淮河大水,皖北到处哀鸿遍野,灾民为了生存,开展抢米活动。蒙城县灾民李大志组织数千人的抢粮队伍,在皖北各地抢粮,他们所到之处,将富户和地主的粮食一扫而光。这支抢粮队伍声势浩大,抢粮斗争震惊了当时清政府。后来,在地方政府的围剿下,抢粮队伍才被镇压下去^⑧。山东省晚清以来,灾害比较频繁,灾荒之年,灾民的抢粮风潮连续不断。《大公报》记载:“南乡有饥民二百余名结党成群沿路骚扰,闻有富户囤积粮食若干,晚来竟被该饥民抢掠一空。”^⑨1911年,兖沂曹济四属连年荒歉,饥民聚众抢劫^⑩。民国二十三年,豫、皖、苏、浙四省于两个月内,即发生较大之抢米事件22起,参加人数俱在数百至一二千以上^⑪。近代,淮河流域各地抢粮风潮此起彼伏,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打击了各地农业经济生产发展。下面,列举近代淮河流域规模较大、影响较显著的几次抢粮事件:

1.1898年安徽霍邱抢粮风潮

1897年,安徽皖北大地接连爆发旱灾和水灾,各地农业收成多遭淹没,灾民人数达百万之多。霍邱县开始发生旱灾,农田缺水,大部分禾苗枯黄而死,旱灾后又爆发水灾,真是雪上加霜,当地灾民苦

① 河南省建设厅:《河南建设述要》,1935年,第19-20页。

② 董汝舟:《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东方杂志》1932年第29卷第7号,第14页。

③ 袁大化:《戊戌定乱平巢记略》,《近代史资料》总5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④ 《申报》1928年12月10日。

⑤ 刘月泉、刘炎光修,陈全三、魏松声纂:《重修正阳县志·大事记》卷3,民国二十五年,第47页。

⑥ 王鑫宏:《灾荒与社会秩序——以民国时期河南灾荒为中心的考察》,《当代经济》2014年第13期。

⑦ 《冯廷韶家书》,《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5期。

⑧ 汪志国:《近代安徽: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⑨ 《大公报》1910年7月6日。

⑩ 董传岭:《晚清山东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山东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第83页。

⑪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47页。

不堪言。为了求生存,灾民傅延龙领导发动了抢粮斗争。1898年1月28日,傅延龙开始组织抢粮队伍,其人数有300-400人。2月3日,他们抢分了地主杨文举的粮食,次日,又分了地主郑士民的400余石稻谷。随着灾荒的扩大,附近灾民纷纷加入抢粮队伍,其人数不断壮大,达到了2000多人。傅延龙开始树起“打富济贫”的旗号,将抢粮队伍进行分工,组织抬枪队、大刀队、扁担队、妇女队和抬粮队。自此,这支抢粮队伍由开始单纯抢粮,演变为反抗地主压迫的阶层斗争。2月22日,傅延龙领导起义队伍攻打方家圩大地主圩寨,结果,遭到失败,队伍被迫解散^①。

2.1910年苏北面粉公司的粮食骚乱

清末,苏北地区灾害严重且频繁。据统计,从1840年至1911年,苏北地区所受的大小水灾就达56次,大小旱灾32次,潮灾9次,风灾12次,地震4次,虫灾7次^②。1910年和1911年,淮河流域连续遭受特大水灾,苏北灾情严重。灾荒年份,灾民成千上万嗷嗷待哺,惨不忍睹。灾荒发生后,政府虽有赈济,但杯水车薪,有名无实,而地主、粮商为了自身利益,囤积居奇,致使粮价奇贵,灾民无粮可吃,普遍面临生存危机。许多灾民聚众阻止谷米外巢,要求平糶谷米,进而演变为抢夺粮食,甚至一些近代粮食加工企业也未能幸免,其中以1910年苏北三家面粉公司发生的粮食骚乱较为突出。当时,江北有三家面粉厂相继被灾民抢劫,它们分别为江北清江大丰公司、海州海丰面粉公司和宿迁永丰面粉厂。

1910年,苏北连遭大雨,灾情较以往更为严重,灾民人数成倍于往常。4月,江北屡次发生灾荒,灾民生活困苦不堪,“清淮两属贫民,已稟明提台王清河县陈,准赴大丰厂取面粉度命。拟定本月(三)月初八九日,一同前往该厂就食,不约而同,务必如期,以免饿死沟壑云云”^③。初八日早晨7点,清河南北乡四百多灾民每人手持口袋和铜元数枚相继闯入大丰公司,声称要购面度日。灾民抛击砖石,碰毁门窗,用携带的绳索拽倒公司烟囱,军警闻讯进行弹压,灾民仍不退回,后来擒获三人后,方才散去;初九日,更多饥民再次涌入大丰公司,讨要粮食,又相继在兵警驱逐下才离去^④。

3月,海州城内灾民成千上万,嗷嗷待哺。海州绅董葛润田、殷克勤在城内倡办粥厂,招徕饥民。此举吸引了四万余灾民赶来领取免费饭票。但该粥厂仅发一万多张饭票,与灾民人数差距甚远,引发未有饭票的灾民抗议:“我等同是一般饥馁,又复同时到厂,何得异视?”面对群情汹汹,粥厂人员答道:“粥厂系我等私款创办,焉能普济?如伊等必欲得食,可向新浦公司要求,伊处粮面甚多,虽尔等再添数万,亦吃着不尽矣。”^⑤这样,大批灾民涌向海丰面粉公司。十三日,成千上万灾民冲向海州新浦海丰公司,意图抢劫粮食,公司开枪抵拒,击毙九人。第二日,灾民更多,扬言烧抢公司,面粉厂立即关闭大门,公司司机洋匠连放数枪,但灾民仍不为所动,拆毁厂房院墙三段,毁坏前后门。第三日,灾民聚集人数高达二万余人,将厂内麻袋及机器焚抢殆尽。后来,经官兵驱逐,拿获数人,事件才平息。

其后,徐州府宿迁县,灾情严重,饥民较多。十五、十六日,城门前有多人割裂米袋,十七日抢豆饼,十八日,数百人抢城北马路口张家面坊内王姓、周聚源槽坊、周合太、王启后、任茂春、陈万隆、孙正大、陆姓、董姓等店三十余家富户数家、行户存米数十石、内河客船四只^⑥。同一天,宿迁永丰面粉厂同样遭焚抢。上午,“忽有棍徒向宿关迤东亚西亚火油公司取去火油二听,五谷庙美孚火油公司取去火油六听,一拥而往,直达该厂,闯进厂门,将火油倾入机器房等处,加以木皮燃烧,一时火焰冲天,无可补

① 汪志国:《近代安徽:自然灾害重压下的乡村》,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9页。

②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37页。

③ 《江苏清江乡民行劫大丰面粉厂未成》,《东方杂志》第7卷第4期(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大事记,第56-57页。

④ 孙昉、王娜:《视点与盲点——〈东方杂志〉所报道的清末民变》,《淮阴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⑤ 《江苏清江乡民行劫大丰面粉厂未成》,《东方杂志》第7卷第4期(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大事记,第57页。

⑥ 《江苏清江乡民行劫大丰面粉厂未成》,《东方杂志》第7卷第4期(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大事记,第56-57页。

救。”^①当时。饥民万余人乘机抢去小麦数千石,“不仅抢粮也,衣服及妇女装饰品亦有窃取者矣。已而狼烟突起,万象如潮,则城北面粉公司(永丰面厂)焚矣。……但见火焰烛天,屋瓦飞崩。有抢其长木材料者,有窃其零件机器者,提者携者负戴者,不计其数;溺者火者死伤者,亦莫知其详。数里外土车人力车,皆鳞次栉比,大约皆运转者也”^②。

三、因抗租抗税而引发的冲突

灾患之年,农业歉收,灾民生存本就困难,原本指望政府救济,但政府和地主的租税却迭加,为了生存,近代淮河流域各地掀起抗租抗税的浪潮。如1905年,山东兖州发生了乡民抗税斗争。近代苏北灾荒严重,但苛捐杂税却不降反涨,这引起苏北乡民自发的抗租抗税斗争。1915年,江苏扬州江都东乡宜陵一带田主因近来屯田与民间同价,要求所有屯田均拟改收籽租,这加重了租户的负担,因此,各租户相约十余庄一致反对,并各办枪械利器以为最后决裂之后盾^③。1916年,扬州东乡五洲杨家桥董事藉沙田缴价,这引起乡民反感,于是聚众反抗,不遵缴纳,并将该董事打伤^④。1916年1月25日《申报》记载了扬州东乡屯田佃户反对加租,并聚众抗租事件:宜陵河北庄营等处佃户聚众闹事,爬毁庄头房屋;大桥之东姜小庄等处屯田增租,引发乡民聚众反抗。

另外,江苏盐垦区引起的抗租抗税斗争也比较显著。文献记载“本区域为佃耕农占最大多数之区域(佃耕地占全部耕地面积90%以上),益以佃耕人与地主向无密切亲善关系,于是租佃问题,遂纷纷发生,要求减租也、抗租不纳也,时有所闻。初尚系以佃租为争执中心之经济问题,浸假而为感情问题,或阶级对抗之社会问题。地主与佃耕人均各本其利益之立场,互相争执不已。如民国十七年东台大丰公司所发生之佃潮及二十年南通通海垦牧公司四、五两堤要求减租风潮均其较著者也”^⑤。

近代,乡民抵抗租税斗争最初原为经济问题,后来演变为阶级斗争,事态扩大为社会问题。如1934年安徽省各县的农民暴动因由抗税所引发。安徽“(各县烟苗税)总数共780万元”,无论是否灾情,这些税收应缴的数目不能少。除了税收定额之外,还有驻军的额外征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额外敲诈,“一有不随,便是毒打百出”。灾民实在忍无可忍,于是聚众抗税的农民暴动,纷然而起,如“三月间的涡阳农民与驻军之战,一月间正阳关农民之武力驱逐特税处人员,八月间萧县、铜山之农民暴动,其中尤以七月间之宿县惨案与八月间之灵璧民变为轰动全国”^⑥。

灾荒年代,无论是水资源、粮食资源争夺还是抗租抗税的斗争,这几种社会冲突类型都与乡民的生计和经济收入直接相关,即使有些冲突最后演变成阶级对抗,那也是在乡民的生存权无法保证的情况下,被迫引发的农民暴动,因此,这些社会冲突,是灾民在灾害打击下为了求生而产生的一种被动的、盲目的反应,所以说,灾害的发生是乡村社会冲突的直接导火线。

自然灾害虽然是近代淮河流域乡村社会冲突的直接原因,但是其深层次原因还是在于脆弱的农业社会经济发展上。近代淮河流域,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灾害爆发的频度和程度趋于严重,而原本

(下转第69页)

①《张人骏关于江苏宿迁饥民焚抢永丰面粉公司与黎经诰往来札禀》(1910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辛亥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0页。

②《宿迁乡民行劫面厂余记》,《东方杂志》,第七卷第五期(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国大事记补遗”,第27页。

③樊翠花:《清末民初江苏乡村民变问题研究》,苏州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第259页。

④《申报》,1916年1月11日。

⑤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1015页。

⑥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三联书店,1957年,第1015页。